

汉苑血碑

彭 拜





汉



苑



血



碑

彭拜

花城出版社

汉苑血碑

彭 拜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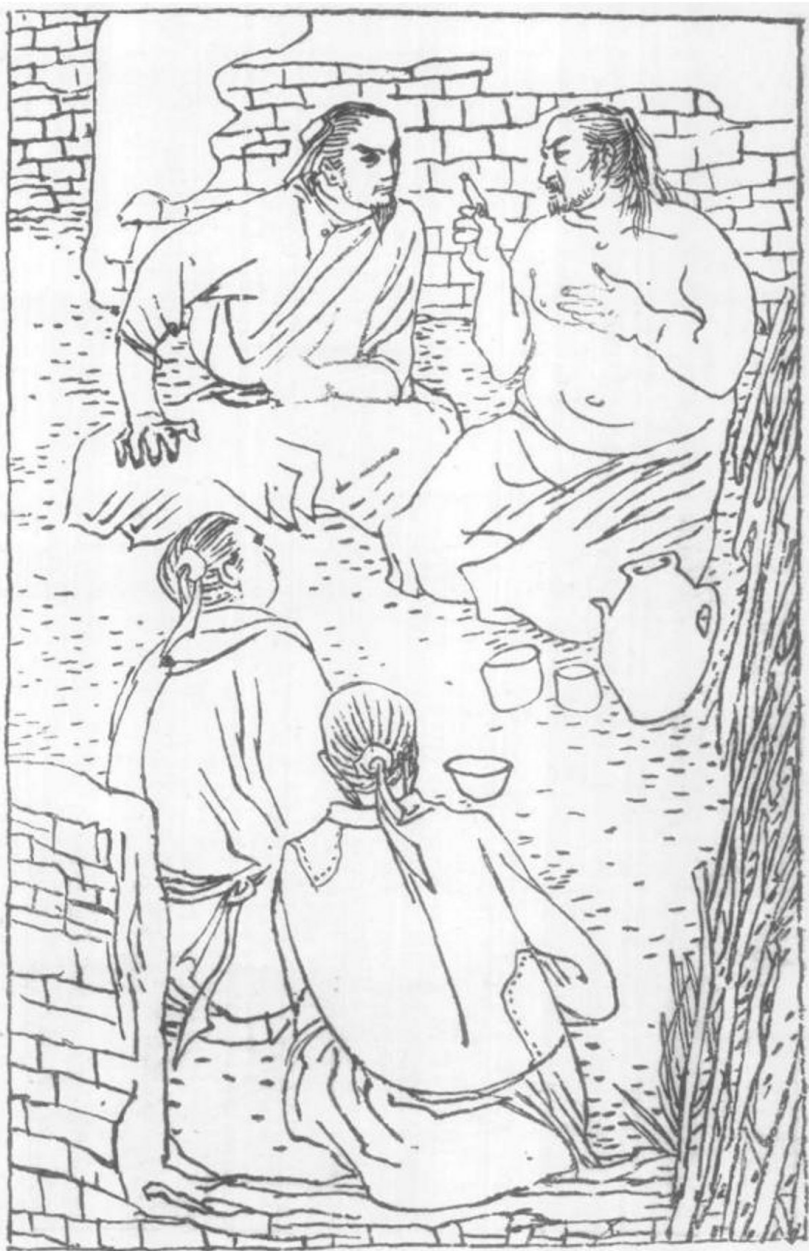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5.125印张 5插页 30,000字

1987年4月第1版 1937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4,6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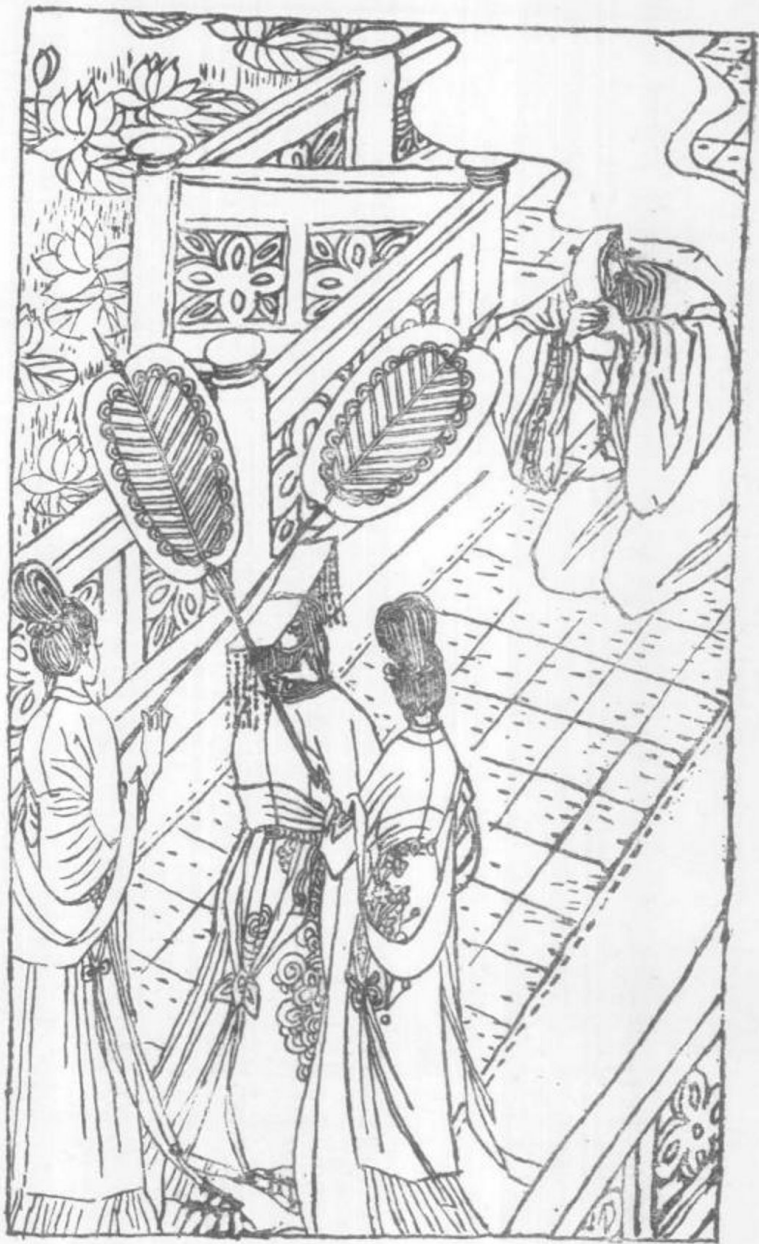
书号 10261·896 定价 2.80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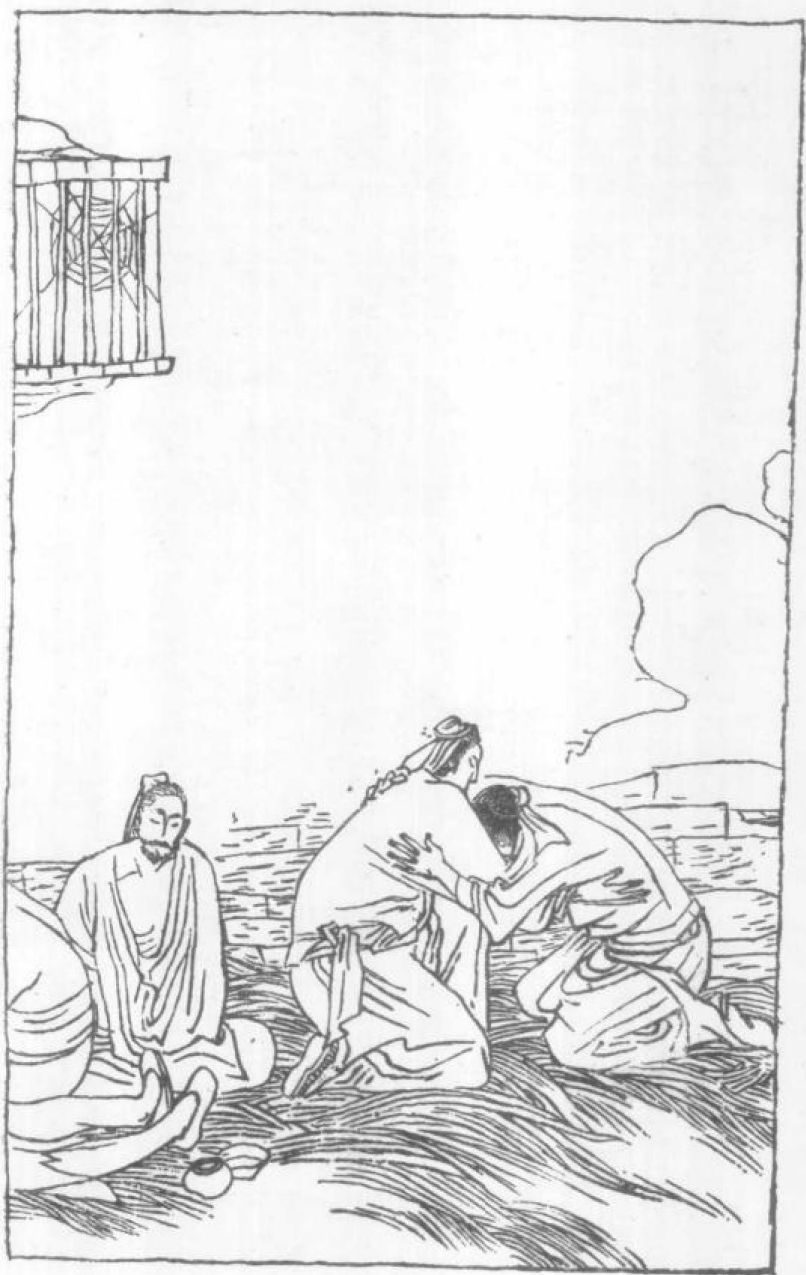
李膺听到这里，心里一震，连声暗叫惭愧。——世间万千财物，国家万千支付，莫不仰赖于民，取索于民，而民所得却是深陷艰辛，难以聊生，不堪为命！



李膺扪胸自问：我来此主政三年，可做过什么对不起这里人们的事？



张让想到，他的这座府第就在永安宫近侧，若让皇帝登台看到它规模那么宏大，气势那么雄伟，简直和宫殿一般，将会引起皇帝的不快。于是连忙伏身跪倒在皇帝的去路上。



陈实头还在旋转，眼还在发花，抱他的人把他安顿坐下：“欢迎你老哥来，这使我们阵容更加雄壮，但不知……”



陈蕃十分紧张，圆瞪两眼，逼视窦武：“大将军定要从长计议，万不可逞一时之念，应该顾念大汉江山社稷……”



范滂和苞娘到了一处。按照夫妇二人这时的激越之情，是应该紧紧地搂抱起来。可是他俩却在洗衣石两边，像两尊雕像，静静地对面站住。



到了李膺策马渐渐没入村前山外之时，姜夫人那一直抑制着的眼泪，扑簌簌地夺眶而出。



张俭明显地有些反常，失去他平日那种斯文、持重的态度。

秋风萧瑟天气凉，
草木摇落露为霜。……
忧来思君不敢忘，
不觉泪下沾衣裳。……
明月皎皎照我床，
星汉西流夜未央。……

——曹丕《燕歌行》

序

吴秀明

作序是一件严肃庄重的事，通常情况下只有名人和师长方能享配。然而，自一九八四年以来，彭拜同志在与我信件来往中，每每谈起他那时正在执手写作的历史长篇《汉苑血碑》时，总一再提出要我为之写一篇序言。他的诚笃很使我感动，但也令我心里不胜惶恐和犯难：写吧，岂不是斗胆妄为，让人笑话；不写吧，又有违于他的一片至情和厚意。让我这刚刚学步的学子来为父辈一代人作序，彭拜同志此举，实在是有点越出常规。

在中国新时期为数不多的历史小说作家行列中，他是属于多灾多舛的一类。文化大革命前，他饱尝极左路线的蹂躏之苦。危厄的境遇，灾难忧患的生活，磨砺了他的意志，也为他日后对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严酷命运的描写，埋下了情感的契机。他的命运太不幸了，照实写来，简直就可以成为一篇催人涕下的作品。他曾经跟我说过，他以《乔迁志思》为题发表在《安徽文学》月刊一九八三年第四期上的那篇所谓的“散文”，其实就是写的他个人的亲身经历。我记得，当时读这个作品，我是动了情，流了泪的。呜呼，人生若此，太凄惨了。于是，我才进一步懂得：为什么他对封建专制摧残人性、摧残知识特别愤懑，对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无辜遭厄感受特别深切；为什么他的作品——无论中篇或短篇，尽管彼

此题材不一，立意有深浅之分，描写有粗细之别，但它们的基点，却无不都落在对封建专制、绝对君权的批判上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与他个人的经历有着某种内在的血缘联系！

是的，一百个观众心目中有着一百个汉姆莱特。对于历史小说创作来说，同样一个历史素材，落到不同作家手中，也完全有可能写出截然不同的作品。这不仅因为作家彼此取材的角度不同，艺术个性有异，而且还在于他们因生活经历不同而形成了各自的敏感区，在对描写对象的感应和把握上，彼此都有属于自我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趣。我们这样说，当然无意于要现今的历史小说作家去步彭拜的后尘，先到“盐水”中去煎熬一番，然后再搞什么创作。如果作这样的理解，那是荒唐的。我们只是说，当厄运不可避免地向作家袭来时，它未尝不是同时在铸造着作家。厄运当然是不幸的，但不幸的厄运对作家来说，有如战争、地震、瘟疫之于人类，从客观意义上看，它却能成为作家进行艺术积累和生活体验的难得良机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历史小说突发性地冒出了一批名篇佳作，其中不少作品特别是中短篇作品，描写封建时代知识分子被酷政践踏的不幸命运和痛苦心境，数量上一直有增无减，艺术上颇能叩人心弦，我以为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。事态正像恩格斯所说：“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，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，甚至比黑格尔，都要重视历史。”由现实触发下的历史感的冲动，对封建知识分子生活遭际的描绘，今天已成为当代历史小说中的一块不竭的“酵母”。

大概经受的苦难太多太涩之故，彭拜同志在他的作品中，以己度人，鉴今知古，对他的先哲们——以往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逆境和苦状特别能体察入微，洞烛其里，真切地

予以抒写出来。这些，往往也成为他历史小说中的最精彩的篇章。他收在《潮州梦》集子中的几个中短篇，以及刊发在《金城》杂志一九八五年第五期上的《也无风雨也无晴》等作品，都鲜明地显见了这一点。在这数量加起来总共不过十多篇的作品中，那司马迁、苏武、李陵、韩愈、刘禹锡、苏轼等人的形象内涵或许不够丰满，但他们各自所处的苦境却写得牵情动魄而又令人感慨万端。作者讴歌他们出污泥而不染的情操和节守，赞美他们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和艺术家的良知禀赋。同时，也不无痛心地披沥他们身上积淀的沉重的精神因袭。小说之中，通篇弥漫的是悲剧的氛围。那浸渗在纸上的痛苦、幽怨、悲愤、不平，和那非人的灾难忧患生活内容搅拌在一起，使作品陡生一种沉重感甚至压迫感。读彭拜同志的历史小说，松松快快、舒舒畅畅的时候是不多的。我揣想，这可能是由于他不自觉地将自我的辛酸悲苦“嵌入”作品的缘故吧。

然而，以上所说的仅仅是他作品的一个方面。也许更重要、更珍贵的并不在这里。他的作品，悲剧的情味很浓。有些惹人悲事的描写，甚而不无令人痛生齿寒骨冷之感。但是尽管如此，那“悲”境深处始终升腾着一股“气”——一股凛然正气、血气、抗争之气。这就形成了他作品悲壮高亢的格调。他作品中历经磨难的人物，同他本人一样，都堪称是“虽九死而犹未悔”的热血男儿。他们无辜获罪，蒙冤受屈，但凛凛气节不可夺，耿耿志向不稍移。他们对生活抱着积极入世的态度，而没有沉溺于哀叹个人悲苦酸楚的境地。收在《潮州梦》集子中的历史中篇《三人行》写及的司马迁，在受宫刑、蒙耻辱时，他的态度是：“我不能死，我要继续写《史记》！”

我要以更大的无畏，更高的精神境界，更丰富透彻的人生阅历，去完成这一著作。固知此后仍有阻障，尚多风险，但决心继父志，尽天职，本初衷，从众望，直到写完最后一个字；任含粪土绝不辞，纵遭万戮终不悔！”《也无风雨也无晴》中的苏东坡，在陷入所谓的“乌台诗案”、身囚槛车之际，“他也依旧未想改变初衷。作文，写诗，实在是平生最大乐事。‘意之所到，则笔力曲折，无不尽意，’要他袖起手不动笔，才是要他领受世间最大痛苦。”……壮哉，司马子长，东坡居士，中华民族真正的人杰钟秀！他们的精神风采就是今天读来也令人肃然起敬。当然，人们也许会说，这里所写的是司马迁和苏东坡，并不昭示着作者什么。但是我要说，当你具体品读他的作品后，你便会从中有所感悟，领会到一点什么。中国古典文论中经常援用一句老话，叫做“文如其人”。对于这句话，人们的解释并不完全一致。我的理解是：有什么样的人品，就有什么样的文品，这是容不得半点作假的。借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，就是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，从喷泉里喷出来的都是水。如果说以上的理解是符合彭拜作品的实际，那末，我认为，他对司马迁、苏东坡等人积极的入世态度，不屈的抗争精神的描写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其实正是他对现实——准确地说，应当是他在身处逆境之时对现实的人生观、创作观（“文革”前，他写了近一百万字的历史小说、历史剧，“横扫”期间，全部付之一炬，毁之净尽）的一个曲折反映。所谓的司马迁、苏东坡，在我看来，很大程度上实乃是彭拜的“夫子自道”。很难设想，如果作者本人在厄运降临时心灰意冷，悲观绝望，那他怎么能如此真切生动地将蕴含在司马迁、苏东坡等人悲剧史事中的精神骨髓揭示出

来，并且倾注了如许的热情和挚爱，写得深沉蕴藉，荡气回肠。

写到这里，使我不禁想起了他的为人处世的品性。在与他四年多的文字之交的过程中，我常常惊异于他的坚毅和乐观，通脱和率真。虽蒙受了如此的不公，但他从不在人前唠叨什么，仿佛压根儿没有发生过似的。一九八三年秋，我们初次谋面于杭州，当我问起他那段不堪回首的惨厉经历时，他抡起左手一撇，说：“那都是昨天的事了，让它过去吧！”随后，便是一阵爽快的笑声，转入了其它的话题。他说此话，也许是不经意的，但我这个晚辈听后，心中却久久不能平静。我从心底里发出这样的感叹：“多好的中国知识分子！”从他身上，我似乎找到了为我们这代人所欠缺的精神元素。是的，年轻人奋发进取，最少保守思想。但是，年轻人往往也容易偏激，经不起挫折。正像我们年轻人需要父辈一代人理解一样，对于父辈一代人，我们年轻人也有一个如何理解的问题。我觉得，在和彭拜同志接触过程中，我们彼此的距离在日趋缩短；相互理解，相互勉励，使我们竟结成了“忘年交”。

作为父辈一代人，他有自己的自信和执著；同样，他也有自己的局限和悲凉。他在人生的苦海里泡了六十多个春秋，与年轻人相比，剩余的时间确实不那么富裕了。因此，他常常产生如同鲁迅先生所说的“赶快做”的念头。他扳着指头计算时间，争分夺秒，伏案创作。他的健壮硬朗的身体在这点上帮了他的大忙。他为写作《汉苑血碑》，孑然一身到西安、洛阳，寻找未央宫遗址，汉魏故城，以致右腿扭伤，经久不愈；他在进入这部书的创作阶段，每天早晨三点多起